





山里山外

一个支教志愿者与他学生们的十年



李广宇◎著




贵州人民出版社
贵州出版集团公司



山里山外

一个支教志愿者与他学生们的十年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山里山外 / 李广宇著. — 贵阳: 贵州人民出版社,
2007.12

ISBN 978-7-221-07951-0

I. 山... II. 李... III. 纪实文学 - 中国 - 当代 IV. 1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78525 号

责任编辑: 张良君

装帧设计: 毛雨工作室

山里山外——一个支教志愿者和他学生们的十年
作者: 李广宇

出版发行: 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(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)

邮编: 550001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印刷: 贵阳科海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1/32 889 × 1240mm

印张: 9

字数: 264 千字

版次: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221-07951-0/I·1627

定价: 18.00 元



目 录

前 言 楔子,10年的机缘 1

我用了十年里学生们写给我的信件,用了十年里和他们打电话时的片段回忆,还有十年里无数次回盘县时与他们的面谈资料……所有这些成了我书里一位老师和九个学生的故事的基础。

第一章 张老师的2007:那个最美丽的乡村女教师 6

在大山深处有太多像张老师一样的普通教师,他们无奈于微薄的收入、艰辛的生活甚至是有些寂寞的人生,但他们仍在努力尽职尽责地工作;他们仍有梦想,梦想自己有一施展能力的舞台,培育出一批一批有益于社会的人。但创业的路是那么漫长……

第二章 孙继宇的2006:打工传销迷途的无言回归 37

我的学生里有很多走出大山到城市去闯荡。但到了城市,他们很轻易地被类似于传销的工作骗去时间、金钱和精力。为什么?原因很简单,他们太渴望被人承认,渴望通过工作来证明自己,渴望融入到城市生活当中,但城市里能给他们提供的机会有多少呢?那些需要高文凭的工作、需要高素质的职位,对他们来说,像不可逾越高门槛。所以,当传销这样一个没有任何限制的工作向他们挥手时,他们怎会有所迟疑呢?

第三章 朱强的2005:爱是暗夜最亮的星 69

和一般人一样,我的学生也有对爱情的渴望和追求。但农村青年,特别是男青年,追求爱情、婚姻的道路格外地艰辛、漫长,也正是这些艰辛让这对年轻人演绎了一段动人的爱情故事。

第四章 宁杰的2004:有一种选择让人失去所有 99

来自大山的青年与我周围的很多年轻人一样,喜欢现代化的城市,喜欢更舒适的生活,但他们更容易被诱惑。因为他们在成年之前生活在闭塞的山区里,初入城市后,环境的突然变化,会令他们感到莫名的慌乱、无助,在诱惑面前,常常无法做出正确的选择……如今宁杰已消失了,但他留下的故事却多多少少让我们思考,并成为一种界限。

第五章 江春莲的2003:父亲,请多给我一点爱 129

听江春莲讲她童年的故事,有太多的感动,因为那里面包含了她对完整人生的渴望。对很多人来说,完整是人生里最简单的要求,生命的完整,生活的完整。江春莲得到了生命的完整,却没有得到生活的完整,她的童年生活对她来说,堪比一场灾难。在她眼里,父亲似乎永远是一个“坏人”。

第六章 孙明的2002:死亡原来也是这般美丽 161

在10年的回述中,孙明是唯一让我流泪的学生。他的死应该让我知道什么?意识到什么?我多么想再回到10年前,再站在讲台上当他们的老师。如果那样,我一定会多





几次去孙明家家访,给他更多的关心。他是一个聪明、懂事的孩子,也是一个有思想、有公民意识的新一代农民,可惜生命对他来说太短暂了。

第七章 张颖的2001:我只为爱情私奔 191

对于一个平凡的人来说,爱情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,我的那些女学生也不例外。如今她们像种子一样四散天涯,为了一个深爱的男人,为了一段只有自己体会的浪漫爱情。在这一点上,她们和我周围的女人没什么不同。但是,从农村来的女孩,她们在追求爱的过程中,更体现了一种感动人的朴素、善良。也正是这样,她们极有可能受到伤害。

第八章 张言武的2000:那个时候,那个女孩 219

那些拥有初恋的人是幸福的,因为有可供回忆的温暖片段。10年之后,我还没听说自己的学生里有一对当年的同学如今结为夫妻。不过,那种青涩的、朦胧的爱的感觉,一定曾经藏在那些少男少女的心里,多年以后温习起来,依旧酸酸甜甜。到了我这样的年纪,才觉得那也是一种财富,在人生最初的懵懂当中,爱的感觉如同烛光,一点点,却能照亮最平淡的人生。这一点,农村孩子和城市孩子都一样。

第九章 余淑敏的1999:留给学生时代的最后记录 247

余淑敏的日记写得很好。在她的日记里,我们可以读出一个女孩到少女的成长过程。从对自己的关注、对父母的关心,再到对家乡的认识,以及对社会的看法。余淑敏眼

山里山外——一个支教志愿者和他学生们的十年

里的世界随着年龄增长在慢慢放大,她内心的情感也随着成长而越发浓厚。从懵懂的女孩到体会爱恨的少女,这样的过程是一个破茧而出的过程,是美丽绽放的过程。

后 记 **20年后的我:有多少梦想让我们激动** 275





前言

楔子

10年的机缘

暮春某个清冷的早晨,我被惊醒,噩梦。

那些熟悉的身影又在梦里出现,我的学生们。

10年。

过了那么长的时间,我竟然仍能在梦里看到他们的面容,而且,那么轻松地喊出他们的名字——余二妹、吴周林、马明权、李本贤……在那个梦里,我又回到了教室,站在他们面前,给他们读朱自清的《背影》。可我还没读完,他们便吵着对我说,李老师,我们不学这篇课文!我问他们为什么,他们说,我们就要毕业了,我们需要学会怎么挣钱。我责怪他们,说赚钱只是人生的一部分,学会了人生道理才是最重要的。

如果在当年,我这话是多么坚定而有力,如今,连我自己都会笑这话的虚弱和空洞。

这是我为什么会从噩梦中惊醒的原因。

我一直希望探询10年对我、对我的学生的改变,这种改变不但是容颜的衰老,更是对外在世界、对内在人生的改变。

当年我给学生们留下了一篇作文,叫《10年之后的我》,那时我好像不出10年是如此迅速地过去,那些字迹稚嫩的作文如今仍被我翻看。大多数孩子是不明白10年会怎么消磨一个人的生命,会怎样改变一个人的想法,所以他们只是草草地勾画了一个梦——那只能是一个梦,因为后来大多数学生都无法实现10年前写下的预言。



山里山外——一个支教志愿者和他学生们的十年

10年，他们星散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里，默默地成长。在乡下，他们可能是最普通的农民，和他们的父母一样在田地里劳作，并很早地结婚、生育；在城市，他们像大多数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一样，在钢筋水泥之间攀爬，并且常常为拿不到一年的收入而痛苦、焦虑；在家乡，他们可能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些人，而在异乡，他们又是最被伤害最多的一群人。

可他们在我的眼里，从来都是和我一样的普通人。他们有他们的喜怒哀乐，有他们的幸福与悲痛，还有他们的梦想与努力。只是因为环境的不同，他们才和别人有着不一样的生活历程。他们的人生可能很平凡，但生活的经历却并不平淡，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我会选择一个特别的时间，再回盘县。

我需要寻找和倾听。

10年！

一位写作的前辈说，再平庸的人生，如果以10年为尺度去回顾，也都能显示出足够的戏剧感。我相信这话。我似乎也需要一次发现之旅，找寻那些如戏剧般的人生和这些人生故事背后的某种深刻。

……10年于我似乎没有什么改变——那些熟悉的名字和容颜，不会因为10年而模糊；那些曾经的往事与回忆，也不会被10年磨蚀，为什么？因为那些过往是如此刻骨铭心，以至我愿意用一次寻找他们的过程，来激励我的内心。

2007年的春节，我上路了。

……

挤！

在昆明我没有买到火车的卧铺票，只能站着去红果。盘县政府已经从老县城搬迁到红果，我的学生会在那里等我。

下午三点多开出的火车，要到十点才到，还可能晚点。我给学生发短信，让他们先吃了饭再到车站，他们回短信说，等我一起。

慢车，每个小站都要停，但上来的人已经不多，大多是从昆明上车返乡的打工者。看哪一张面孔都有点熟悉，后来我有点想明白了：我的学生也和这些人一样，候鸟一般，每年的假期都要背着大大小小的行李，回家过年。





这是他们的春节,从他们回返的那一天开始。

火车没开出多久,我就支持不住了,坐在冰冷的地板上。一个孩子坐在我对面,他妈妈站在他侧面,用身体保护着他。孩子脸蛋儿有明显的高原红,眼睛直直地看着我。我笑,他也笑。

一个乘务员过来,孩子挡了他的路,他用脚拨了一下,孩子的妈妈尖叫起来。吵,孩子大哭,有人骂,有人叹息,有人往这里挤,可能是孩子父亲和他父亲的同乡,都一样的矮小,脸色黝黑,粗糙的手指和愤怒的表情。

乘务员退却了,还骂着什么。

安静了,孩子已经睡去,嘴边有口水如注流下。

我站起来,背疼。

我刚站起来,尺把大的地方,马上另一个人蹭过来坐下。

……

将近十一点,火车停靠。

出站台,黑暗里有人喊:李老师!

三个学生从暗处走来,韩艳平、韩家文和冯丽。

那天晚上我们住在一家很简陋的旅店里,喝了酒,几个人聊到很晚。第二天韩艳平陪我回两河,想去几个学生家看看,遗憾的是他们都不在家。有的学生这一年春节仍要留在外面打工,有的学生已经嫁人,这个春节要去婆婆家过年。走到两河三岔路口,韩艳平突然问我,还去学校吗?我想了想,摇头。这里曾是我和学生相处一年多的地方。现任学校很近了,我已经能感觉到它的气息,但我却在临近它的时候犹豫了。这个春节那里一定很冷清,而且,现在的我已经不属于那里了,回去看什么呢?只有学生还让我牵挂……

在盘县的五天时间里,我度过了人生中第一个一个人的除夕。那天上午,学生们都回家去准备过年的事情了,我一个人在热闹的红果街头闲逛,第一次这么近地看这个新兴的城市。和往常一样,那天晚上我睡得很早,外面鞭炮声于我仿佛梦里学生的笑闹声,旧历的一年就这样平淡地过去。

大年初一的早上,我早起,打算去老县城,出来却找不到班车,原来司机也都放假了。我只好拦了一辆出租车。老县城更加破败了,到处

山里山外——一个支教志愿者和他学生们的十年

是垃圾。春节里很多店铺都关了门，大街上人却多，似乎都和我一样，没有目的地来回走。

我离开盘县那天，同样没有班车，我只好去买火车票，那仍然是一列慢车。在等火车的两个小时里，冯丽一直和我聊天。记得以前她是一个很内向的女孩，我都想不起和她说话的时候。10年之后，我才发现，她其实是一个很开朗的女孩。

……

回到大连以后，关于学生们的很多故事让我深深感动，并有所感慨。

10年前是我给了学生一些东西——知识、自信、勇气和对未来的期待，而10年之后，则是他们给了我很多——他们与众不同的人生经历，他们对生活的点滴看法，以及他们一直不曾放弃的对美好生活的追求。

现在他们已经成了我的老师。

所有的感念到最后就变成了写作的冲动。

10年前我写了《大山深处》这本书，那本书后来给我带来了许多烦恼，原因之一就是我在书里关于盘县贫困的描述，引起很多人的不满，包括现在盘县的某些领导。2006年我回盘县时，在某个酒桌上，一位教育局的干部就直截了当地说，他对我的书有想法。我没说话。

10年！我已经无须再为我的那些文字做任何解释。

那是我亲眼所见、亲身所感，我只写了一个外乡人眼里的盘县，也许主观一点，但却是真实的。在真实的贫困和虚假的繁荣之间，当年的我，一定会选择更真实地写作。到今天，我还是愿意坚持这个原则。可能教育局的领导不需要这样的真实，这和我没有关系。

我更愿意相信，因为我的书在报纸、杂志、网络等媒体上的传播，让盘县被更多的人认识 and 了解。有一些简单的例子，从我们离开盘县以后，大连每年都派出青年志愿者到那里的山区支教，从我们离开两河中学，那里开始调进大量正式老师，从我们离开两河以后，盘县接受大量外来捐助——数目可能很少，但，这些都是普通的城市居民的个人捐助！

我相信自己的写作是善意的，我从没看不起我的学生，以及他们





背后的那些人。

10年之后讲学生的故事，依旧是善意的。

我用了10年里学生们写给我的信件，用了10年里和他们打电话时的片段回忆，还有10年里无数次回盘县时与他们的面谈资料……所有这些成了我书里一位老师和九个学生的故事的基础。这九个人的身上有我很多认识的老师和教过的学生的影子，但并不确指其中的某个人，我这样做是想用更小的篇幅载入更大量的内容，把那一群人的生活展现出来。

我希望自己有能力反映出自己学生在10年当中的变化，正如我希望我的学生能从书里找到他们的影子，并惊喜地告诉别人，李老师写到了我的故事了！

同时，为了避免叙述上的重复，我在这本书里主要选取了一位老师和八个学生10年当中对他们影响最大的那一年来写，这样写作的好处是我可以集中使用某些细节，来表现生活的变化对他们以后生活的改变。

和10年前相比，10年后的写作中，文字已不再是障碍，已经脱离钢笔和稿纸，一天写一万字也不算什么。但还是会有一些遗憾，那就是我和学生们情感上的疏离。10年里，两地的阻隔，让我只能偶尔与他们书信或电话交流，即使回到他们身边，也都短暂异常。所以当他们真正面对痛苦和挫折时，我只能远远地鼓励，而不可能与他们一起体会和跨越——这在一定程度上让我的讲述少了很多激情。

总会有那样一些遗憾。

也好，再用10年来补救吧。

……

第一章

张老师的2007

那个最美丽的乡村女教师

到盘县的第一天，我就给张老师打电话。她的婆婆接了电话，说她和丈夫一起去赶场了。刚好朱强在我旁边，问他，他说知道那个地方。春节前的乡下，几乎每个人口聚集的地方都会有临时的乡场，类似北方的年货大集。

挂了电话，我对朱强说要去乡场上找张老师。他很奇怪地问我，张老师不是要生孩子了吗？怎么会去赶场呢？我说我不知道，心里也很疑惑。

在去盘县之前我和张老师通过电话。她告诉我，她马上就要临产了。因为这之前有过两次流产的经历，这一次她特别小心。我问她预产期是哪天，她说刚好是我计划里离开盘县的日子。我当时还想，怎么这么不巧啊！

我对朱强说，我们去找张老师吧。朱强有些犹豫，但没说什么。

等上了车，我问他，你不愿意见张老师吗？他没说话，只是笑笑。他的心思我是知道的，有很复杂的情感在里面。而这些复杂的情感多半和张老师的婚姻有关。

张老师是我在盘县时搭档教初中一年级四、五班的英语老师。关于她的回忆总是那么清晰。

第一次见张老师是那年开学的第一天。我们开完会，从会议室里出来。张老师和她妈妈在会议室外面等校长，似乎有什么事。那时张老师是一个胖乎乎的女孩，头发梳得有板有眼，看陌生人时眼睛总是垂





下的,偶尔一笑,露出雪白的牙齿。等我们回教师宿舍不久,她和妈妈也一起来宿舍,这时我才知道她也是这一学期过来教书的。

张老师是我第一个认识的代课老师,当时她的工资是每个月150元——那时从两河到盘县的路费来回是10元,她的工资可以想象有多么微薄。

张老师从四川的某个大学毕业,自费生,毕业后在父母的要求下回了盘县,但又找不到更合适的工作,最后在亲戚的介绍下来两河教书。

那时我担任班主任的班级需要英语老师,便请了张老师来教。她很高兴地答应,并且教得非常认真。到山区以后,我不大适应气候,经常得病,她就代我管理班级,所以在学生们那里,我们两人都好像是他们的班主任老师。

学期开始后,我不断下乡家访,只要有时间,张老师都会陪我一起去。有了张老师,我下乡家访的路走得要顺畅一些。比如方言,比如风俗习惯……每次想起这些,我的内心总是充满感激。如果说盘县给我留下了那么多的美好印象,那么张老师就要占据最大的一半。

张老师的家境一般,在离开盘县前,我曾经去过她家。从公路走很远,进一个山洼,张老师的家就建在半山坡上,是一座老房子。到她家,张老师坚持不让我进屋子。她说,家里太破了,不如就在院子里坐。那天她家里只有她妈妈和弟弟妹妹,那时她的哥哥开货车跑长途,她的父亲在矿上上白班。

我还记得那天吃过饭,张老师还带我去矿上见了她的父亲。她父亲是一个沉默的男人,但他会包好吃的饺子。张老师告诉我,因为矿上的北方人多,他父亲手巧,向那些人学了包饺子的功夫——那时张老师每次周末回家,都会给我带些饺子来,每吃一次,都会让我想念遥远的北方的家。

去她家的那天下午,她走了很远的路送我到路边等车。她问我,下次你能找到我家吗?我说,能啊。她不相信的样子,叮嘱着说,你一定要记住啊,别走错了。我点头,没说话,心里有点酸酸的……

从贵州回到大连以后,我还经常梦见去张老师家的那条路,那条

山里山外——一个支教志愿者和他学生们的十年

路边的那条浊浪滔天的河。其实回大连之后，我隔不多久就会再回贵州，几乎每次回去都要见张老师。她的生活，于我是那么的熟悉。

时间，将她的生活分割成几部分；时间，也将我的回忆凝固在某几个端点之上。

1999年，那个让人迷茫的夏天

那天中午，我正在休息，学生突然跑上来敲门，说，宁杰和别的同学打起来了！他还被打破了头。我吓了一跳。跟着学生往学校跑。

宁杰是以前初一四班的学生，初二以后我就不教他了。可学生们还是习惯于有什么事就来找我。等我跑到学校操场，打架的人已经散了。一些学生聚在会议室外面。我走过去，从窗子往里看，宁杰正捂着头站在墙角里。

我推门进去，听见教导主任正在训他。主任看我进来，对我说，这样的学生就应该开除。

我问，他怎么了？主任说，打架，还动了刀子。说着他指了指桌子上的刀。

我很吃惊，也不知道这些学生是怎么了，进入高一年级是应该懂事一些了，可他们却越来越不像样子。我一时说不出话来。

说话之间，主任的火气有些消了。他奇怪地看着我，问：你有什么事吗？

这时我才想起，自己并不是宁杰的班主任老师，甚至也不教他什么课程，这样跑进来，总要找一点借口。

我有点尴尬，但还是说，我听别的学生说他出了事，就过来看看。

说完，也不管主任怎么看我，直接走到宁杰跟前，伸手去摸他的头，想看看他的伤口。可他很执拗地扭过头去，不让我看。

我想了想，说，要是出血了，就到老师那里包一下。说完，我从会议室出来，让一个学生等在那里，等宁杰出来，带他到我的宿舍。

我回去没多久，宁杰就过来了。

我问他为什么打架，他也不肯说，恨恨的样子，好像还不服气。我不理他，拿出止血药和纱布，帮他包头上的伤口。包着包着，他突然哭出声来，我以为他是疼的，安慰他说，马上就好了。





他摇头,说,不是疼。

我问,那你怎么了?

他说,心里难受!

我问,到底是怎么回事?

好半天他才说,班长骂我。

我知道他说的那个班长,父亲是个干部,在学校里称王称霸,却没人敢管他。我说,这样的人不要惹他。

宁杰拧了一下头,不服气地说,为什么?就因为他父亲手里有权?我没说话。

这社会太多不平等的事情,哪个能讲得清楚,都靠拳头什么也解决不了。这些大道理和他讲了他也不会听的,他多年轻啊。

给宁杰包了伤口,又嘱咐他不要沾水,才送他出门。

本来只是热心给宁杰包了一次伤口,我却因此得罪了某些人。

第二天教导主任就在全体教师大会上说,有的老师不要偏袒那些表现不好的学生,这样做,只会让这些学生变得更坏。

开始我没把这话当回事,等散会出来,一个老师悄悄问我,主任说的是不是你啊?

我很疑惑,想想才明白她指的是给宁杰包伤口的事。

她说,你还是小心一点,教导主任这人记仇,不好说会对你怎么样。我心里“咯噔”一下,说不清楚是什么滋味。

不过我心里很坦然,并没觉得自己对学生好有什么不对。

又过了几天,没什么事情发生,我也放松下来。

宁杰被记大过,我在学校遇到他,安慰了他几句,还劝他以后不要和人家打架,免得没法初中毕业。他只是点头,也不知道他听进去多少,学生越大,越难知道他的心思。

这事似乎这样过去了。

有一天上课,我在黑板上写单词时,后面有学生扔粉笔头,打在我的身上,等我回头,学生们在下面哄堂大笑。我非常生气,问是哪个扔的,可没一个人承认。

我气极了,让所有学生都站起来,想罚他们站上一节课,直到那个扔粉笔的人站出来。可有几个个子很大的学生不站起来,还来起哄。我一摔教材,转身就走,不上了!我当时心里就这么一个念头。

回到办公室，刚好遇到那个主任，他问我怎么了？我没说话。看见他都觉得别扭，从办公室出来我一个人回宿舍了。

课间休息的时候，那个班的班长过来找我，替其他同学向我道歉。我的火气还没消呢，把他们都赶了出去。过了一会儿，一个学生喊我去学校，说是教导主任找我。我一想就没什么好事，不过我还是去了。

主任见了我就批评我，说我太任性了，对学生不关心。说了很多话，说得我心里特别难受，泪水忍不住流下来。主任说，你回去准备一份检查吧，下次教师开会做个检讨。

我问，为什么要我写检查？说我有错，就是没到下课时间我出来了，可那是因为学生调皮……

主任打断我的话，说，你是当老师的，连学生都管不好，还怎么当老师？

我说，管理学生是班主任的事，还有学校领导的事，我要做的就是教书。

主任冷笑，说，那你上课，班主任就要跟在你身后了？

他是强词夺理。

我一时无话。他来劲儿了，说，你不就喜欢和调皮的学生交朋友吗？这次怎么了？还被调皮的学生给欺负了？

我这时才觉得他的阴险。

回到教师办公室，几个正在说笑的老师见我进来，都不说了。他们的表情说不上是可怜我还是嘲笑我。

当时我在学校里教英语课，课程不多，也不当班主任，所以上完课我总是回宿舍看书、备课，那时我特别不喜欢在教师办公室里呆着，主要因为我的身份是代课老师。虽然工作没什么区别，可与其他正式的老师在一起，心里总有些自卑感。

那天我回到宿舍，心情很不好，我真的不想干了。这想法很久以前就有了，这一次特别强烈。晚上，以前教过的学生余淑敏过来看我，问起我白天遇到的事——学校里的事总是传得很快。

我简单说了说。

余淑敏说，张老师，我表姐在那个班读书，她知道那个拿粉笔打你的人是谁。

我摆手，赌气地说，我不想知道。

